

移民岁月

第3期

YI MIN SUI YUE

各条战线支宁忙

刘天明

教育领域支宁。1949年宁夏临近解放时，共有各级小学639所，学生4.5万人；共有普通中学7所，学生1006人；共有普通初中及中等职业学校15所，在校学生1700余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总体上看，宁夏解放初期，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人才十分匮乏。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宁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到1952年年底，全省小学有787所，在校学生69498人；中等学校15所（其中中专7所），在校学生3689人（其中中专2287人）；1958年宁夏成立3所高等院校。1958年小学数量增至2349所，在校生达到284970人；中学增至60所，在校生达到2930人。宁夏教育发展极为迅猛，20世纪60年代调整时期，有大幅下调，但与解放初相比，发展也是十分快的。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校舍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大量的教师，而宁夏教师人才缺乏，只能从全国引进。在国家的倡导下，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到宁夏高等、中等、小学教育的队伍中。1956年3月，为解决小学教师短缺问题，甘肃省从

上海、天津等地招收4000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分别安排这批青年在银川师范等11所师范学校培训，培训期半年，银川师范培训的学生，结业后分配在银川地区各县小学任教。1958年4月5日，《银川日报》报道，北京330名男女知识青年到宁夏支教，4月2日前，他们已分批去固原、吴忠、银川3个专区所属的各个市县充任小学教师；1958年8月21日，首批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100余人到达银川。这些教师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北京回民学院调来的教师。

以贺兰县为例，也可见支援宁夏的外省籍贯教师对宁夏教育贡献之一斑。1956年，贺兰全县学校由1949年的43所增加到81所，教师数额严重不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贺兰县的中小学教师，除来自大学本科、专科和中师的毕业生外，尚有天津支宁初中毕业生、浙江支宁知识青年、北京支宁初中毕业生、河南支宁高中毕业生以及上海支宁的文教大队。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知识分子扎根贺兰，和本县教师融为一

体成为贺兰县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宁夏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从外省迁移到宁夏的知识精英所开创的。以宁夏大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外地人。1980年宁夏大学历史系成立时，最初的12位老师全部是外地人。

文艺工作者支宁。解放之初，宁夏文艺领域除一些秦腔等方面的戏班子、杂耍班子之外，没有高档次、上规模的文艺团体。随着宁夏解放后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应宁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抽调一批批文化艺术人才支援宁夏，他们为宁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6月4日，中共宁夏工委举行联欢会，欢迎从北京到宁夏工作的50多位文艺工作者，他们充实到宁夏文化艺术界，成为骨干力量；1958年9月22日，遵照国家文化部指示，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迁到银川，组建宁夏京剧团。1958年9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院成立；1958年10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越剧团成立，当晚在银光剧院以名剧《刘戏金蝉》与观众

见面。宁夏越剧团由上海华艺、红花、光艺等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成。

医务人员支宁。支宁医务人员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主要力量。一是从全国各医学院、护校分配来的医务人员。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天津来宁夏的大批医务人员，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骨干力量，有些甚至成为权威性专家。1969年10月，天津21名医务人员下放永宁县工作。其中有的分到乡医院工作，如5位天津医务人员被安排到望洪卫生院安家落户和工作；1969年11月天津市700多名医务工作者及上千名家属相继到达银川，赴山区农村安家落户；1961年11月，天津市947名医务人员及家属迁入石嘴山市（有医务人员248人），其中天津市第四医院整体迁入大武口，建立煤炭井矿务局大武口煤炭职工医院（俗称“天津医院”）；随迁职工及家属906人，占当时天津支宁人员总数的44.99%。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天津医务人员返迁天津。改革开放后，一些文教人才也返回了原籍，但仍然有许多人留在宁夏。

将艺术青春献边疆的宁夏京剧团

1958年10月，宁夏京剧团（当时称京剧院）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建立起来了。宁夏京剧团的前身是中国京剧院四团。

中国京剧院四团是我国京剧艺苑的一朵奇葩，是由原西南军区京剧院和原中央军委总政京剧团于1955年合并组成。在战争岁月里，他们曾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鼓舞部队士气。他们曾跟随贺龙同志进军大西南，把戏送到战斗前沿。解放后，又曾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把戏送到人烟稀少的沿海岛屿和西北高原的边防哨所。他们还曾背着服装、道具，翻越海拔5200米的雀儿山，把戏送到康藏高原筑路英雄的工地上。后来，又跨过鸭绿江，把戏送到中国人

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的朝鲜战场上。这个团多次到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且经常担负出国演出的任务。不少演职员分别随中国艺术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赴苏联、罗马尼亚、埃及、苏丹、巴基斯坦、日本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55年，一部分演员还曾随中国艺术团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演出由本团改编的《闹龙宫》一剧，荣获舞蹈一等奖，并被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许多演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等多种奖项。1958年9月22日，中国京剧院

四团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文化建设，来到塞上古城银川，改名为宁夏京剧院（后改为宁夏京剧团）。从此，他们扎根宁夏，将自己宝贵的艺术青春献给了宁夏的各族人民。宁夏京剧团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学习农民的高尚品质，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节假日，他们把戏送到工厂、矿山，给工人兄弟的生活增添了乐趣。部队的营房、哨所也曾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还从宁夏出发，把戏送到各个省区，南至广东、广西，北至辽宁、黑龙江，东至青岛、大连，西至青海、新疆。宁夏京剧团在全国的京剧团中实力比较强大。可以说人才荟萃，名角云集。如：杨派老生的优秀继承者李鸣盛，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的得意高足王吟秋，梅派演员李

丽芳，马派老生王和霖等。

宁夏京剧团扎根边疆，战胜了重重困难，与全区人民并肩战斗，为建设宁夏，发展西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为褒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移民对宁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完整记录和展现宁夏移民历史，讲好宁夏故事，进一步凝聚全区各族人民建设美丽新宁夏的信心和力量，日前，宁夏政协正在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宁夏移民史料征集工作。广大读者如有线索和资料，请踊跃投稿。

联系人：李青峰
电 话：0951-6019060

珍贵记忆

长城边的盐池县：盐尽仍留“盐文化”

如今廉价的食盐在古代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有着2000多年产盐史的吴忠市盐池县因盐而兴、因盐得名，因军事防御和盐池之利，隋、明两代更是在盐池县境内修筑4道长城，盐池县因此被称为“露天长城博物馆”。

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所产池盐作为边区的经济支柱，曾为边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指出：“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

随着时代变迁，池盐已不复当年辉煌，盐池县从2000年起几乎不再产盐。尽管没有了池盐之利，盐池县依托滩羊产业等，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为发掘池盐的历史文化内涵，盐池县正在着手复原打盐工序、开展打盐体验游，“复活”池盐文化，提升盐池县文化软实力。

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从银川市出发向东行驶，进入吴忠市盐池县境内，高速公路两侧的长城、烽火台、城堡便明显增多。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的盐池县为何有如此多的长城遗址？答案是池盐。

在古代，因盛产池盐，偏居西北的盐池县不仅因盐兴旺，甚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进而有了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盐池县先秦时为“戎狄居地”，所产池盐被称为“戎盐”。汉代，盐池境内设朔衍县，并在此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记载：“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水经注》曰：“（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肥）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又说：“县东有温泉，泉东有盐池。”据宁夏社科院研究员薛正昌等人考证，书中“盐池”便是盐池县南部的惠安堡盐池。除了历史记载，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汉墓群还出土了盛有食盐的陶器。

盐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党英才说，历史上，盐池县有大小盐湖20多处，比较有名的有惠安堡盐池、滥泥池、苟池、北大池等七八处。

明代花马池城今为盐池县花马池镇，是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周边有大小盐池数个，此地因用池盐换马最早被称为“换马

池”，后改为花马池。明代历任三边总督，都在花马池一线加大兵力，修筑长城。明朝正德（1506-1521年）初年，总制陕西军务的杨一清曾驻守花马池城，当时仅花马池城就有戍防军队1万余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后，西北防御压力加大，花马池城在秋防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兵部要求驻节今固原市的陕西三边总督（辖甘肃、宁夏、延绥三镇）每年秋天亲往花马池城调度指挥，并秋驻于此。这说明除了防御，“防护盐池，以通盐利”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崔允曾作《花马池咏》，写道：“秋风揽辔下边城，万里河流绕骑清。樽俎试看酬壮节，壶觞到处遏行旌。寒骄强弩传箭，飏转轻车火作营。慷慨十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可见当时花马池沿线浓重的军事氛围。

现在唾手可得盐在古代价比黄金，明朝周鼎写有五言诗《盐池》赞惠安堡盐池，其中两句写道：“调和偏有味，生产自无穷。若使移南国，黄金价可同。”池盐因此在明代成为重要的军费来源。长城沿线驻守大量官兵，对粮草、军马等的需求较大，明代便通过“纳粟中盐”“纳马中盐”“纳茶中盐”等方式，用盐为军队换来各类物资和银两。据薛正昌考证，正德年间，灵州池盐年销量已接近18万引，约1800万公斤。

“大家到盐池驮盐去”

当记者来到距离盐池县城十多公里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打盐处，久经风雨的明长城遗址在开阔的平原上显得有些低矮，20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打出的窑洞已不复当年模样。汽车在长城脚下往来，不远处的盐池在夕阳照耀下光洁如镜，颇有壮美荒凉之感。

80多年前，这里打盐的热闹景象曾让埃德加·斯诺心向往之，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霜，产量很大。”

在革命时期，对于苏区而言，盐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盛产盐的盐池县则为边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1936

年6月解放后，盐池县因产盐成为边区“聚宝盆”，盐业发展迅猛。1936年10月，毛泽民在盐池县成立了盐池税务局。1937年，陕甘宁边区更是发出了“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通知。

尤其是1941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后，盐池掀起打盐高潮。除了当地民众，八路军三三五九旅四支队2000多名指战员来到盐池集体打盐，修筑盐田1094亩，一年打盐62万驮左右。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局《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指出“组织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党和边区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

因池盐产量大增，以至于盐池县驮盐的毛驴、骡子不够用，盐池群众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用牛驮盐，用牛驮盐速度虽不及骡马，但胜在驮盐量大，这在当时还作为重大新闻被《解放日报》配图刊发。1943年，陕甘宁边区三边专员罗成德还因打盐被评为“劳动英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从盐池运出的食盐约有1236.3万驮，合12.5亿公斤左右。盐池所产池盐除了满足边区需求，还为边区换来了急需的各类物资。

“复活”池盐文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盐池县的池盐产出逐渐下滑，以至在2000年后几无池盐产出。而这背后除了行政区划因素外，耗费大量人工、效率相对较低也使得池盐逐渐没落。

当记者驱车在惠安堡盐池边缘行驶时，70岁的老盐工茹汉民颇为紧张，水量较少的盐池更像沼泽，汽车很容易陷进去。盐池里过去“田”字形的盐田、水渠、盐坝等依然清晰可辨，并分布着很多形如火山口的盐井。茹汉民说，这些古人传下来的盐井直径10米左右，深十多米，传说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茹汉民家世代以打盐为生，他说：“原来惠安堡盐池大概有400块盐田，后来逐渐减少到100多块。每年的5月1日到9月1日气温升高后便到了打盐时节，村民将盐井水引到一格格盐田中，并调和以雨水等加速池盐结晶。经过自然蒸发、捞盐、挑盐、晾盐等工序

后，池盐便生产出来了。”

打盐十分辛苦，今年63岁、曾打盐近30年的张孝对此记忆深刻。“我十七八岁开始打盐，刚开始没有抽水机，每天都要用轱辘从盐井提水，经常从凌晨4点一直干到中午12点，累得不行。惠安堡盐池因盐层薄无法使用机械，打盐全靠人工，盐田夏天水温非常高，盐工都是赤脚下田，被盐层扎破的脚泡在盐水里刺得生疼。”张孝说，通常两三天打一次盐，用工具把盐刮下来在盐田聚成小堆后，还要人工挑盐，一担盐将近200斤，压得盐工肩膀上都有一层厚茧。

虽然打盐很辛苦，在当时却“吃香得很”。张孝刚开始在盐场打盐一天记10个工分，还额外给3毛钱工资，而这3毛钱可以极大改善一家人的生活。1981年包产到户后，张孝、茹汉民等7人承包了6块盐田，每年人均打盐收入超过1000元，张孝在承包盐田第二年就购买了“两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过上了当时的富裕生活。然而，随着精制碘盐的普及，池盐逐渐没落，自1981年至2000年的近20年间，张孝的打盐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随着池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盐池县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在2018年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而盐池县的脱贫“法宝”滩羊也与盐池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境内分布大量盐池（当地群众习惯称之为碱滩），盐池县的地下水大多为苦咸水，草原生长的草营养价值也较高，在碱滩“喝碱”泉水、吃中药材”的盐池滩羊品质上乘。加上滩羊身体是白色，自然放牧时远看像一片片碱滩，故称为“滩羊”。盐池县也因盛产滩羊而被称为“中国滩羊之乡”。

尽管不再产盐，这并不意味着池盐历史在盐池县的退出。近两年，盐池县试图依托全域旅游发掘池盐的文化价值。党英才说，池盐曾为陕甘宁边区作出过重大贡献，如果将盐文化丢掉了十分可惜，盐池县的称谓也将名不副实。盐池县正在规划恢复两个盐池，再现打盐工序，开展体验游，借助盐文化提升盐池县的文化软实力。（据《新华每日电讯》）

往事回顾

回忆我在中央党校的生活片断

路思温

1936年，我在延长县任县苏维埃土地部长时，6月初，接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通知，让我到省府所在地瓦窑堡开会（当时党中央也在这里）。会开了几天就停止了。一天下午，领导找我说：“现在时局突变，我们都要撤出瓦窑堡，有60多人要你带领去中央党校报到。”当时中央党校也随中央机关住在瓦窑堡，我很快带领这批新学员到党校报到后，就立即进行撤退准备工作。第二天凌晨，中央党校首先撤出瓦窑堡，转移到安塞县的杨家园。几天后，又转移到志丹县。高级班住在任家坪，我们普通班住在刘家坪。

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老百姓的生活也同样很困难。地主老财都把粮食埋在大山野地窖里，我们吃的粮食，大部分要自己设法解决，烧柴也要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背。根本没有菜吃，有时供给一点胡麻和盐面，就很不不错了。能挖回一点野菜来，大家都很稀罕。吃饭用具也很缺，如果谁有一个碗或缸子，那就很不错了。有些同志没有吃饭碗，经常等别人吃过后借用。有的同志，只好在河里找一块石板或到村子里找一些破盆烂罐来代用。

党校的生活条件虽然如此艰苦，但学员们的精神都很饱满，学习热情很高。我们除学习党的历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时事和政治常识外，还要学习军事课程。白天听课和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小组讨论。因为连吃的油都没有，所以晚上不点灯。小组讨论都在窑洞中摸黑进行，虽然互相看不见，却讨论得很热烈，逢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就坐在月光下开会。每周只给各队部发蜡烛两支，供晚间有重要事或看文件和哨所用，用后立即熄灭。

学校为了改善生活，特地办了一个合作社，动员学员入股，每人多者几角，少者五分。当时每人每月只发苏维

埃币两角，大家手中都很紧，仍能踊跃入股，积少成多，办起了合作社。

有一次，合作社买来一批鞋，要求分配时，首先照顾没鞋的同志。我们从瓦窑堡撤退时，非常紧急，大多数人只有脚上穿的一双鞋。到了这里，每天都要参加军事训练，经常外出背柴、背粮，走的全是山间石子小路，很多人的鞋，早就烂得不能穿了，我们这个队，40多个人中，就有20多个经常赤着脚。这次分给我们队的鞋只有3双，僧多粥少，怎么办呢？最后大家决定采用抓阄的办法。我碰巧抓了一双。后来解放了定边县城，党校准备搬到定边去，合作社也要结束了。学校用合作社的一点盈利会了一次餐，每人分到一小碗有肉的烩菜，4个黑面小馍馍。这在当时算是一次最丰盛的会餐。

1936年9月，党校搬到定边县城后，生活有所改善，没有碗筷的同志领到了碗筷，每个小组还领到两个搪瓷脸盆，供集体打饭、打菜用。还能经常吃到黄米干饭和羊肉。这时最大的困难是天气渐冷，到十月间还没有棉衣。定边的天气冷得较早，早上出操时，有的同志只好披着被子上操场。直到后来发了棉衣，才度过了冬天。

我在中央党校只学习了6个月，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和大家一样，始终情绪很高。、尤其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党员，参加革命只知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斗地主，分田地，打敌人，革命道理知道得很少。经过半年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心胸开阔了，眼睛也更亮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从党校抽调90多人，由李维汉（罗迈）同志率领，返回志丹县到中央局工作。我们第一批干部，于1936年12月中旬离开党校，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册）

同心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苏绍平 整理

同心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同心县城豫海北路东侧烈士陵园内。

1936年，为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and 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山西返回陕北后，又决定组建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5月中旬，西征红军共计17000余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安、延川一带出发，挺进陇东，攻战三边，驰骋宁夏，解放同心，并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此期间，西征红军红十五军团在这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曾与国民党马鸿逵展开了历时近半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战斗有：攻克豫海县城——下马关战斗、占领王家团庄战斗、韦州攻城战斗、红城水伏击战斗、甘沟战斗。牺牲在这里的红军烈士有：红十五军团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师参谋长李铁民、七十八师二三三团团长彭义隆、某连指导员李国珍、连长孔作林、回民独立师某连马连长等（其余姓名不详）30余人。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西征红军撤离时因下乡在外没来得及随军转移，转入地下开展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马鸿逵部逮捕，并于1937年4月3日在同心老城西门外英勇就义。

为纪念先烈以教后人，1978年同心县委和政府划地62亩在县城豫海北路东侧建立了同心县烈士陵园，将马和福烈士的遗骨及牺牲在下马关、韦州等地的红军烈士的遗骨搬迁集中安葬于陵园内，并先后拨款修建了“豫海亭”“红军

烈士亭”“豫海烈士纪念馆”及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烈士纪念馆等。198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50周年，国家投资16万元，同心县民政局负责，由咸阳古建筑艺术公司承包，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主体为混凝土构造，碑座四周为黑色大理石镶铂，碑座上面竖立着12根镀金栏杆并以镀金链条相围。基座呈方形，见方15米，碑身见方10米，高21.6米，碑的正面为唐天際の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北面为程子华的题词“为革命献身的回汉烈士永垂不朽”；东面为李志民的题词：“为人民解放牺牲烈士：英灵浩气千秋在，先烈精神万古存”；南面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身下部正中间镶铂的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着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题写的碑文。碑文正文为“为纪念1936年红军西征和建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牺牲的烈士，为纪念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同心和巩固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献身的烈士及一切志士仁人特立此碑，以表万世。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整座纪念碑庄重典雅，使人不由产生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60周年之际，县政府又拨款将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了维修，同时将陵园前部改建为“豫海公园”。园内松柏苍翠，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雅别致。每年前往参观者及中小學生扫墓接受教育者不下万余人次。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